

民国以来冀中庙会的发展

胡思瑶 王 猛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庙会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的民间节日,是冀中农村地区重要的物资交流场地,也是普通民众信仰的地方。近代以来,战争、灾害都削弱了冀中地区的经济,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庙会的发展空间,导致冀中地区的庙会逐渐萎缩。建国以来,各地都在积极地恢复和重建庙会,为建设新农村提供精神、物质和娱乐场所。而如何更好地利用庙会这一特殊的民间节日,也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冀中地区;庙会;民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冀中地区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也是冀中地区庙会的形式和内容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在这个时期,冀中地区的庙会经历了发展、萎缩、恢复和改造的过程。在这之中,以中共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对庙会的改造无疑是最具有时代特色的,为了把庙会改造成为宣扬共产主义信仰的阵地,也为了把庙会变成对敌经济斗争的阵地,中共对庙会进行了全新的改造,在突出农村经济交流的同时也把庙会变成了巩固新生的基层政权的阵地。但这种改造并非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有些方面的改造在民众之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并未引起我们的注意,在传统的研究中,我们往往会遮蔽了中共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为它忽略了农民参加革命的主体性,忽略了传统社会与革命政策的关系,忽略了农民的犹豫和挣扎^{[1]2-3}。正如李金铮在《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共产党与民众、共产党与基层社会并非就是简单的单向“挥手”和“跟随”、“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因此,研究中共对冀中根据地区庙会的改造,有助于我们了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状况。

庙会是连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冀中地区的农村庙会经过了长期的历史演变,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最初的具有崇神色彩的祭祀场所逐渐发展成为提供商品交换的场所。而在这之中,既有其自身主动的变革也有被动的外界影响。

冀中地区庙会经济功能的凸显主要是在明清之后,随着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不断发展起来,并逐渐形成定期的农村盛会。民国以来,庙会的经济功能更加重要,在冀中地区的农村庙会之中,几乎每一个庙会上交易的大宗货物都是农民所必须或急需的,同样在庙会市场上出售的产品大都也是小手工业者生产制造的。可以说,一个地区庙会的兴盛程度直接反映着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一、祭司仪式与共产主义信念

冀中地区的庙会历史悠久,大多都有着传统的祭祀仪式和祭祀内容。这种形式的保留不仅丰富了

收稿日期:2011-06-06

作者简介:胡思瑶,女,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王 猛,男,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庙会的活动,而且对下层民众有着极强的凝聚作用,它能够使广大的农民在内心产生强大的敬畏感,自觉地约束平日里的言行。这种传统的习俗对农村稳定起着特殊的作用。同样在庙会的祭祀中,这种神圣的祭祀仪式一直得以保留下来,并逐渐成为下层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冀中地区庙会的类型众多,祭祀的仪式和内容也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是有着一套隆重的仪式过程,尤其是对那些和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庙会祭祀,更显得尤为隆重。如龙王庙、关公庙、土地庙、八腊庙、虫王庙等,庙会的兴起都与冀中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民众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诸如此类的庙会在祭祀过程中是格外引人注意的。

在原交河县关帝庙会上,对关帝的祭祀可谓是隆重至极,并且有着繁琐的祭祀仪式,甚至超过了对土地祠的祭祀程度。原交河县的关帝庙共有大殿6间,后殿有3间,东西两侧各有3间房屋,还有大门马殿3间。每年的春秋仲月时候取吉利的日子以及在每年的5月13日逢会之日进行祭祀。在这之中,首先祭祀的并非关帝本人,而是在后殿之中祭祀关帝的三代,其中曾祖光昭公居中,祖裕昌公居左,父成忠公居右。之后才真正轮到对关帝的祭祀,在关帝庙的正殿之中同样有着众多的有名战将分列在关帝的两旁,在关帝的东向站立的分别是张飞、王潜、韩擒虎、李靖、苏定方、郭子仪、曹彬、韩世忠、旭烈兀、徐达、冯胜、戚继光共12人。在关帝西向站立的武将有赵云、谢玄、贺若弼、尉迟敬德、李光弼、王彦章、狄青、刘琦、郭侃、常遇春、蓝玉、周遇吉共12人。从关帝庙内雕塑的这些不同时期的著名人物可以看出,自明清以来,关帝庙在民间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了,这一方面是普通民众对关帝自古以来被塑造的完美人格的崇拜,另一方面也能反映人们对战争的避讳,希望通过祭祀这些历朝历代有着显赫战功的将军们来实现早日消除战争的目的,而这种想法自民国以来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这些看似繁琐的祭祀仪式能够一直流传下来,也说明了关帝庙在普通民众心中重要的地位。同样对于其他的神灵,老百姓也是怀着毕恭毕敬的心情去祭祀,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简单的祭祀,而是向神灵表明心迹和祈求实现美好愿望的一种心灵寄托。在武强县,对龙王庙、城隍庙等庙的祭祀更加隆重,每逢庙会之时,头天在各庙行香致辞,次日清晨则有祈祷的官员率领各官到庙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此外祭礼也是十分的丰盛。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庙会的祭祀并非全是传统意义上的烧香拜佛之类的封建迷信,而是有其存在的道理。

民国以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逐渐深入人心,为了能够使国人早日摆脱愚昧,国民政府早在20世纪20年代之时便兴起了反封建迷信的热潮,在“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鬼神批判的论著连篇累牍”^[2],甚至1930年河北省还以政府公报的形式命令各地方严禁庙会期间百姓焚香礼拜,要把各种香火庙改建为学校等。

中国共产党刚刚在华北农村确立领导权之后,就把这种反封建迷信作为一项重要的思想改造任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共大力宣传的是唯物的革命史观,这必然和传统的民间信仰有着冲突,为了能够把共产主义信念更好地贯彻给广大的农民,就必须打破他们心中存在已久的传统的信仰模式。为此,中共便把改造的矛头主要指向庙会上的这种烧香拜佛行为,采取了各种措施,对庙会之中烧香拜佛所用的物品征收高税或禁止其进入根据地到庙会之中进行大力的宣传,同时为了提高民众文化水平,还在各地兴办了学校。对于那些传播封建迷信的分子,也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屡教不改者要进行革命改造。此外,中共还利用庙会之际,大力普及医疗卫生知识,用科学的武器消除人们对疾病的恐惧,达到消除祈神拜佛的效果。这些措施无疑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逐渐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使冀中地区的农民逐渐摆脱了愚昧和落后的生活习惯,使得这一地区的烧纸、敬神的活动大为减少,甚至在一些村中还出现了打破庙宇的现象。

二、庙会的生存与改造

明清以来,庙会经过了不断地改造,尤其是各种政治力量对庙会的参与和改造使得庙会的社会气息更加浓厚。明代朱元璋将全国的城隍庙改造成与地方官府相适应的神权政治,形成了一个严明的等级网络^{[3]194}。在清代,统治阶级对庙会的控制更加严格,形成了与世俗社会相对应的神权社会。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宣传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对传统的庙会文化进行了批判,把庙会中存在的敬神祈愿的

行为斥之为迷信,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进行了批判,然而这种仅仅局限于宣传上而并未真正深入到深层的批判没有起到响应的效果,也并未把科学真正贯彻到普通民众的心中。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共同样对庙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且力度之大、时间之长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中共对冀中地区的庙会改造并非仅仅局限于思想领域,而是涉及了庙会的方方面面,从庙会的管理到庙会的内容,中共都加入了自己的理解,经过这种改造,中共不仅把庙会变成了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经济的场所,也把庙会变成了对敌斗争的重要地点。此外,中共还利用庙会这一盛大的集会积极地宣传自己的各项政策,以达到巩固和壮大政权的目的,并取得了相当有效的成果。

这些政治势力对庙会的渗透使得庙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心灵寄托的场所,而是变成了为各种政治势力服务的地点,同样也是这些改造,使得庙会的人文色彩更加浓厚。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经济水平也在不断地提升,庙会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也逐渐地被人们所忘记,这种现象在冀中地区的农村尤为严重。目前,随着建设新农村热潮的开展,各级政府也在积极地恢复传统意义上的庙会文化,以期待能够为新农村建设增添一份亮色。

显然,时下所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绝不仅仅是只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数字的增长,更不仅仅是“破旧立新”。强调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应考虑如何与有着数千年农耕文明历史的“旧”农村的传统相衔接^{[4]263}。

新时代下,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现代传媒的普及在使得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公民自主性增强、自我意识提升的同时,也孕育、促生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个人主义,并在乡村形成无公德的个人。孝道的衰落、信仰世界的倒塌、具有监督价值的公众舆论的沉默等社会事实^{[5]181-245},这些现象的出现与传统的民间道德的沦丧和信仰的缺失有着很大的关系。

庙会作为传统的民间活动,不仅仅能够“娱人”,也能够“娱神”。然而从“娱神”向“娱人”的转变过程之中,人们却忽视了庙会带给人们的精神寄托和心灵敬畏的功能。作为科学的对立面,庙会上的这些行为长期以来被披上了愚昧、落后的外衣。在新时代的新农村建设中,人们恢复的是庙会作为经济交流的平台和能够给百姓带来欢声笑语的娱乐功能,但是对于庙会最为根本、最为传统的信仰功能的恢复和建设的步伐却是缓慢的。

恢复庙会的信仰功能并不是恢复所谓的烧香磕头等愚昧行为,而是需要唤醒人们对传统的道德和伦理的敬畏感,通过信仰建设来起到维系农村稳定的效果。正如岳永逸在《传统民间文化与新农村建设——以华北梨区庙会为例》一文中所谈到的那样,作为“与农耕文明相伴的乡村庙会虽然有着诸多与现代科学不相符的因素,但它实际上在乡民的生活世界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不仅给个体以新的能量,给村落以新的荣光,也给自然交替以力量,使人、村落、自然免于失范的危险,对乡民生活世界或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着规束与重整”。

建设新农村,道德的规范是必须要重视的,在传统的法治社会之下,传统的民间约束力也应当是存在的。庙会作为农村地区重要的信仰场所应当在新时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建设新庙会,可以在保证其正常的经济交流的同时,积极恢复有益的民间宗教活动,充分利用传统的民间信仰对于个人、社会的道德约束力。“以民间信仰之长弥补政治手段和法制手段之短,以民间宗教之善弥补人性之失,进而促使人的自我完善,同时也使政治、法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身作用。”^[6]建设新农村和建设新庙会并不是冲突的,积极地利用庙会的有利方面可以把新农村建设进行的更加深入。

【参考文献】

- [1]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 [2]沈洁.反对迷信与民间信仰的现代形态——兼读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J].社会科学,2008,(9).
- [3]高有鹏.庙会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4]李小红,赵旭东.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5]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 [6]王星.狂欢视角下的民间信仰导控与乡村和谐[J].传承,2009,(5).

编辑:王巧